

吴景平主编 中国金融史专刊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 (1912—1937)

董昕◎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景平主编 中国金融史专刊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 (1912—1937)

董昕◎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董昕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中国金融史专刊/吴景平主编)
ISBN 978-7-208-08802-3

I. 中... II. 董... III. 中国银行—经济史—研究—上海市—1912~1937 IV. F83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2790 号

责任编辑 曹勇庆
特邀编辑 郑英旻
封面设计 傅惟本

· 中国金融史专刊 ·

吴景平 主编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

董昕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插页 2 字数 365,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802-3/F·1893

定价 38.00 元

总 序

吴景平

众所周知,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对于维系和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运作有着重要作用,与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每个社会成员,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现实生活中的“金融热”有增无减,金融领域的独立性日益突显。随着中国经济与整个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随着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的日益推进,金融诸领域的状况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对于金融学理、实务和实际运作的研究也得到极大的重视。

与理论和现实生活中的“金融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融史研究的冷僻。长期以来,中国金融史只是被视作中国经济史的分支学科,或是金融学和经济史学的边缘学科。近三十年来问世的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著作、教材不可胜数,但中国金融史有分量的成果仍然很有限。虽然在中国经济史的著作教材中或多或少会提及属于金融史范畴的内容,但大多散见于部分章节,主要还是服务于说明经济史意义上的观点。如讲到外国银行时,主要是叙述外国银行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控制及其对华资本输出情况,通常较少涉及甚至完全不涉及外商银行的资本构成、组织制度,特别是业务运作和经营管理;讲到钱庄、票号和银行等华资金融机构,着重说明这些机构与商贸、工矿业和政府财政政策的关系,略于以资金运动本身为主体、主线;为数不多的经济史著作讲到货币发行和流通方面问题时,也往往意在论证政府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状况,金融领域的问题很难作为主体和主线得到较全面的展开。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当然要有金融部分,但这不能取代把中国金融史作为相对独立的对象进行专门性研究。进而言之,中国金融史既属于经济学科的范畴,也应属于历史学的专门史范畴,应当如同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等分支学科一样,在专门史的框架内有金融史相对独立的地位。而从其对象和方法来看,金融史还应当是经济学、金融学和历史学的融合,带有交叉学科专业的属性,应得到各相关学科专业的重视。

中国金融领域的演进有悠久的历史,在整个世界金融体系中别具一格。中国金融史研究有丰富的内容,兼顾中国金融演变的源与流,以中国历史上的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为研究对象,包括金融市场、机构和制度的沿革变迁,以及金融与经济增长、工商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等等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对中国金融史的研究,特别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中国金融演变的状况、特色和在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作用以及两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们很欣慰地看到,自2000年起,六卷本的《中国金融通史》陆续出齐了。该著作分时期地对两千多年中国金融的变迁做了较全面的梳理。然而,中国金融史的丰富内容,需要我们进行更为专门性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金融史的专门性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领域,其代表性的成果是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但该书成书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只写到清代,且在金融机构、市场和制度等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于开拓。从成果较多的近代中国金融史的研究领域来看,在对金融机构的研究方面,以往主要集中在对旧中国国家银行、政府银行的研究上,如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研究较弱。近年来,已经见有对重要商业银行某一时期历史进行研究的成果,但与近代中国有数以百计商业银行的存续与运作的历史相比,相应研究成果很不够。北四行中的盐业银行、大陆银行、中南银行的研究还没有见到专门的著作。南三行中,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研究著作尚未见问世。至于新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国华银行、聚兴诚银行等,均未见研究专著。

如果中国的银行业的历史通过若干银行的历史著作的问世,已经勾勒出大致的轮廓的话,那么对典型的本土金融业—钱庄业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目前较有分量的成果主要是1937年之前的,^①而且缺乏对具体钱庄的完整的个案研究,这与钱庄业内容丰富的历史不相称。从上海地区来看,钱庄业经历了上海由小渔村发展到现代

^① 参见郑亦芳:《上海钱庄(一八四三—一九三七):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蜕变》,“中央研究院三民主义研究所”丛刊,1981年。

大都市的全过程,其业务也从简单的钱币找换扩大到一般银行的经营范围;在上海金融市场,钱庄业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在与银行业的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即便在银行业获得长足发展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银钱两业在诸多领域里都起着并重的作用。但在资本来源、组织构成、投资与经营管理等方面,钱庄业难以适应现代化大生产和高度商品化的需要,更处于金融国际化潮流之外,甚至整个钱庄业长期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一度面临除了银行化便只有停歇的处境。但是,经济发展的多样性、不平衡性,即便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也存在着,零星、小额然而持续不断的金融业务既发生在都市内部,更在上海周边地区中小城镇属于常态,这就是钱庄业得以存续和一定发展的基础。在银行业居于上海金融的主导地位之后,钱庄业的存在不仅是银行业的陪衬。在保持与中小工商业和基层社会关系的同时,上海钱庄业仍然力图跟上时代的步伐,在资本来源和构成方式、经营管理制度等方面有所进步,整个行业维持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作为维持上海城市生活不可缺少的行业、作为金融业中始终不容忽视的力量,近代上海钱庄业体现了中国金融现代化的特定阶段性。至于钱庄业特有的与客户之间的互信关系,钱庄内部雇主、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稳定的关系,似乎也不能简单地与落后、消极划等号。为了应对市场和社会环境的变迁,钱庄业的业务经营、管理方式,也有调整改革的方面。可以说,无论单个的钱庄还是整个钱庄业的历史,都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需要加以研究。

金融史研究中,外国银行可以说是一个空白领域。如何看待近代中国外国银行的作用和影响呢?长时期来,外国银行被视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与中国本国金融业(尤其是商业行庄)有着不同的性质和作用。但已有研究者指出:应当看到,外国银行“既有一个掠夺中国经济的目的,又有一套开拓自身活动能量的手段。作为一个总体而言,它们的确有一套开拓发展自我天地的经营手段。它们有新的离岸金融市场,新的投资方式,新的支付工具,新的金融技术,新的银行管理方法。”^①如果说金融市场就是货币信用活动的市场,金融业是这个市场的主体,那么近代以来普遍从事中国本币业务的外

① 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商银行,就应当如同华资银行、钱庄等一样,理应是整体意义的上海金融业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在中国主权缺失的情况下,外商金融业在享有治外法权和其他特权的同时,在中国法统框架里长时期没有获得明确的“准入”,直到抗战结束后,外商银行才获准加入上海银行公会、成为上海票据交换所的交换银行,为中国银行业所接纳。而外商金融机构在体制、运作和管理方面的先进性,总体上也为华资银行业取法。在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中,对在华外商银行的研究成果,不应当长期付诸阙如。

近代中国的钱庄业、银行业、信托业等金融行业开展业务经营的空间,就是金融市场。

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甚至长期是金融史研究的主流,这本身无可厚非。但是有金融业就有金融市场,除了关于金融机构的研究之外,还应有对近代中国或某一地区的拆借、贴现、内汇、证券、保险、外汇、金银等市场进行单独而深入研究的论著。对于诸多客户而言,金融机构的内部组织、管理与人事是一回事,但金融机构的如何开展业务、进行运作,则是更重要的。换言之,正是各类金融市场,把金融机构与和客户联系在一起,金融市场的研究实质上是动态地研究金融业,是以业务、客户为中心地研究机构。应当看到,与对银行史的研究相比较,对中国金融市场历史的研究更显薄弱。近几年,陆续见有证券、保险、信托、外汇市场的研究成果,但总的看来很不够。中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关系、金融中心地区的各种行情与国内其他地区各自市场行情之间的关系(如上海货币市场的利率确定和对异地的影响)、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财政属性与商业属性、金融市场行情与政局动荡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是金融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至于近代中国的金融团体与组织,更是金融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同业团体,其基础是诸多的行庄。行庄业务经营活动一方面形成市场,另一方面直接催生了各自的同业公会;而在上海地区,还进一步产生了联合准备委员会(钱业为准备库)、票据交换所、票据承兑所等常设专业组织。而金融同业规范的制订修正、同业之间关系的协调、同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处理、与社会的往来,以及与政府之间的联系交涉,则有赖于同业团体。诸如中

国交通两行、北四行、南三行这样的大银行，在业务和市场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近代中国银行业的代表，可是它们对同业并不具有制约作用；但是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的决议却不仅对会员银行、钱庄有制约力，还对非会员银行、钱庄有着重大影响力。可以说，认识近代中国某一特定金融行业的基础和前提，就是了解该行业的同业公会，如上海银行公会是联合准备委员会、票据交换所、票据承兑所、银行学会等组织的发起者、管理者，其本质便是银行业自律、自我管理能力和现代化取向的集中体现。钱业公会同样具有这方面的本质和发挥着相应的作用。对于金融团体和组织的研究，应当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中国金融史还应有对金融制度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尤其是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演变，不仅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还有业内的自律，主要通过金融业同业团体来体现，同时还应注意金融制度在文本上与实际运作的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从时段而言，晚清与民国时期金融史的研究基础较好，经过整理的史料和可资参考的文献较多，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金融史的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某些问题的处理难度较大，应予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近代中国的金融运作，上与政府财政有特殊的紧要关系，下与生产流通与社会生活领域密切相连，这两方面的关系是研究者不可忽视的。此外，近代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金融关系，华洋、新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中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各主要金融政策和制度，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思想、观点、主张、理论、学说，金融家及其企业等等，给有关的学者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研究空间。这些方面的研究可以为推进整个中国金融史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在几年前便推出了《中国金融史专刊》，均为专题研究著作；以后，在继续陆续出版金融史研究的专著的同时，还将收入专题论集、专题资料集。我们期待着读者对于已经问世的各本专著的意见，期待着金融史研究同行赐稿，拓展中国金融史的研究领域，逐渐深化研究的层面。

2009年8月于复旦大学光华楼

目 录

总 序	吴景平	1
导 论		1
一、研究动态		1
二、选题意义		14
三、难点与预期		15
四、篇章布局		16
第一章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建立及机构人员变化		19
第一节 户部沪行与大清沪行		19
第二节 上海中国银行的建立		26
第三节 上海分行的机构人员变化及盈余情况		41
小 结		66
第二章 作为第一区区域行的职能及变化		68
第一节 第一区区域行的建立、运作与管理		68
第二节 中行改组后第一区区域行的活动		82
第三节 区域行对于法币发行的推广		101
小 结		104
第三章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发行业务		107
第一节 沪券的发行与流通		107
第二节 北洋时期沪行有关发行的活动		122
第三节 沪券发行准备公开检查制度的确立与发行情况		135
第四节 领券制度的发展与演变		154
小 结		173

第四章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内外汇与存放业务	175
第一节 内汇业务的发展	175
第二节 外汇业务的发展及协助总处成立国外部	191
第三节 存款业务的发展与变化	201
第四节 放款业务的发展及对象的转移	212
小 结	248
第五章 沪行与联行部、公会的互动及应对金融风潮	251
第一节 沪行与联行部的互动	251
第二节 沪行在上海银行公会中的活动	276
第三节 应对金融风潮与担任总汇划	290
小 结	312
结 语	315
一、对上海分行独立性变迁的考察	315
二、一家分行定位的回归——兼论银行制度问题	325
三、几点余论	333
附录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大事记(1905—1937)	335
附录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重要职员名单(1930—1937)	363
附录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每月发行额统计(1928—1937)	367
参考文献	373
后 记	387

导 论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中国银行曾经是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中央银行,继而改组为国民政府特许之国际汇兑银行。上海分行则始终是中国银行最重要的分行,也是整个中国银行业务活动的中心,简称为沪行。

近年来,对于中国银行历史的研究成为民国史与中国金融史研究的着力点之一。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上海金融市场和民国金融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1949年前的中国银行行史研究的热点之一。1912年至1937年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最具特色的时期。本书选择此时间段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研究对象,以冀对拓宽近代上海金融史乃至整个中国金融史的研究领域,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研究动态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的研究是整个中国银行行史研究的组成部分。

中国银行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国有商业银行,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历史受到中国近代金融史、民国史研究学者的重视,渐成体系。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这一时段内中国银行行史的研究,在《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等专著编纂的推动下,成果丰硕,陆续出版了专著、行史资料,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上海分行是中国银行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分行,对于它的研究也是相关研究的重点。

中国银行在百余年的发展之路中,自身极为重视有关经验的总结与归纳,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为系统整理与编写一部1949年前中国银行的行史,提供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在这些资料中,已刊布的较为系统地介绍1949年前中国银行行史的有三篇:《中国银行自撰大事记》(成文于1931年,见于《档案与史学》,1997年5期)、《中国银行发行史略》(成文于1942年,收入《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二)》,第942—963页)、《中国银行史略》(成文于1945年,刊于《云南档案史料》,1991年第1期)。《中国银行自撰大事记》以分期述

要的形式介绍了中国银行自成立至 1931 年间的各项业务活动,颇具参考价值。《中国银行发行史略》以专题的形式总结了 1942 年国民政府统一发行前中国银行的发行概况,叙述了分区发行的演变、停兑券的整理、集中准备金、发行机构的嬗变及各项券版种类。《中国银行史略》是从中国银行昆明支行的档案全宗中发现的材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银行的前身、成立、发展壮大,抗日战争胜利前的五次改组等情况。这些有关中国银行的专题档案资料先后在学术刊物发表,为深入研究中国银行行史提供了基础。

建国初期,对银行业史进行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张郁兰编写的《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书中将中国银行的发展变化融入了整个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中进行介绍,认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为反对帝制运动而照常兑现的事实”反映了新兴金融资本势力的性质与作用。

1982 年,中共中央决定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为此,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各专业银行编写《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一书。中国银行为了编写一部完整的行史,在完成当代部分的任务之外,决定同时编写一部 1949 年前的行史,成立“中国银行行史编写组”,收集行史资料,并将相关的行史资料分专题连载于 1987 年至 1992 年的《国际金融》各期中。在行史资料的收集告一段落后,总行出版了《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1912—1949)》(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 1991 年版,以下简称《行史资料汇编》)。《行史资料汇编》共三册,分为 22 章,系统地收集了各时段内中国银行的行史资料,内容翔实,较完整地勾勒出中国银行的历史轨迹,有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①在这部行史资料中,有很多关于上海分行的资料,如第一章中有关上海中国银行建立的资料;第四章中反抗停兑令和反对调张嘉璈离沪风潮的资料;第十章发行业务中谈及的有关沪行发行的兑换券情况,以及第十八章每年的年度报告中谈到的各地分行的情况等,都是研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重要的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但《行史资料汇编》是为对中行进行整体研究所编纂的资料集,

^① 参见《中国银行的历史轨迹——〈中国银行行史资料〉简介》,《民国档案》,1991 年第 4 期。

对于各地分行的内容并未作重点或专题性的编辑,对各地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的发展及演变介绍也不足。所幸各地中国银行在收集当地行史资料时,陆续出版了几部分行史资料汇编:《北京的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北京市档案馆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①《中国银行东北地区行史资料汇编》(中国银行辽宁、吉林、黑龙江省分行合编,1996年)、《中国银行福建行史资料汇编(1914—1949)》(中国银行福州分行行史编委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1915—1949)》(《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编委会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银行泉州市分行组织史资料(1916.3—1995.4)》(中国银行泉州市分行行史编委会编,中国银行泉州市分行国际金融调研室发行,1995年)。这几部分行史资料汇编都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各地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地方特色,是研究各地金融史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在行史资料的收集告一段落后,由多位专家编写而成的《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卜明主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行史》)②正式出版。《行史》分为四部分: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

① 该书是中国银行在北京地区分支行的资料汇编。1912年2月5日,中国银行在上海开始营业。4月,袁世凯窃国后,将中央政府所在地移往北京,同时,在北京成立中国银行筹备处,8月正式成立中国银行,是为总行。原已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银行遂改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1914年9月,中国银行总裁萨福懋改组中行的内部机构,将总行改设为总管理处,总辖各分行号,专任指挥监督各分行号之责,而总行原有营业、出纳等局改设为京行,权限与各分行一律,是为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成立。北京分行后改为支行,故该书名为《北京的中国银行》。

② 关于《行史》一书有数篇书评,读者可参阅吴欣:《〈中国银行行史〉的启迪》,《国际金融研究》,1995年第10期;巴曙松:《解放前中国银行组织机构改革的历史与借鉴——写在〈中国银行行史〉出版之际》,《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1期;王传纶:《〈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读后感》,《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1期;陈彪如:《中国近代金融变迁的缩影——评〈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一书》,《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4期;赵燕红:《全面、系统、翔实——评〈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8期;王新生:《中行稽核派驻制度的演进及其启示——读〈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国际金融研究》,1996年第9期。其中,巴曙松文与王新生文在对《行史》一书进行评价的同时,着重从中国银行组织机构改革与稽核派驻制度演进两方面介绍其演化过程及概况。

政府时期(1912—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年)和抗日战争胜利至新中国成立(1945—1949年),共24章。在每个部分的开始,有对历史背景的简要论述;在每个部分的结束,有对这一时期行务工作的总结。全书以朴实的文笔、翔实的资料,全面记述了中国银行1949年前37年的历史,也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展现了中国近代金融发展之路。《行史》是研究1949年前中国银行的历史和近代中国金融史提纲挈领的著作,在介绍了中国银行历史的同时,也对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变迁、货币制度的演变和统一发行的历程、银行管理制度的变化等问题有所涉及,惟其结构体系仍未脱离政治史的框架,在按照金融史本身的特点来进一步分析撰述方面显得不足。除《行史》外,还有两篇学位论文以1949年前的中国银行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分别为邓先宏的《中国银行与北洋政府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十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和尧秋根的《制约与创新:近代中国银行市场化(1905—1949)》(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3年)。

在与本书相关的时间段的论述中,《行史》提及上海分行的历史,从各章各节中可见。《行史》肯定了北洋政府时期沪行在振兴行务方面的作用和国民政府时期协助总处创设各营业部门、发展银行业务方面的业绩,对中国银行的一些制度作了具体的介绍,有助于了解沪行的有关情况。

在《行史》出版前,《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史》(中国银行上海国际金融研究所行史编写组编写,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以下简称《上海分行史》)业已问世。该书记述了上海分行自1912年2月5日经孙中山批准在上海成立至1949年前37年中的业务概况和较为重大的事件,初步分析了上海分行在各个时期的特点、地位和作用。其与《行史》比照研读,可以更充分地了解上海分行的历史 and 在中国银行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上海分行的外汇业务,《上海分行史》介绍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办外汇业务,建立国外汇兑股及协助总处建设国外部的情况,而《行史》还介绍了上海分行代理沪行区11家分支行对国外代理行进行转账的情况,是四个转账区域行之一,对上海分行所办理的外汇业务情况从总的角度作了进一步的介绍,亦可见《行

史》在研究上海分行史及各地中国银行行史中的作用。但是,《行史》是介绍中国银行整体情况的行史,对于上海分行的情况论述得不够全面和深入。

《上海分行史》虽然介绍了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历史演变,但仅书其历史进程之大略,未将对上海分行的研究深入下去。如该书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创设的行庄领券制度、准备金公开检查制度等一些特色制度,未作详细而深刻的述评;对上海分行作为区域行的作用及详情,也未加以叙述。就资料情况而言,该书引用了一些不常为外人所见的档案资料,尤其是将一些资料中有关上海分行的部分辑出,如董事会议事录中有关沪行对财政部借款情况的总计,较为可贵。但全书所引的档案资料不多,且书中所征引的其他资料大多出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包括第一辑、第二辑)和《中行月刊》等;而当时上海金融界的权威期刊——《银行周报》中的相关内容的引述则寥寥无几。在业务与行务方面,《上海分行史》就各方面概况相应地作了介绍,但有些部分也可补充资料,以观全貌。笔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参考了《上海分行史》一书中的有关史料,借以了解上海分行发展的历程。

《上海分行史》的另一个不足之处是未将上海分行的业务与中国银行的业务明确划分开,两者经常混为一谈。《上海分行史》的某些行文仅提及“中国银行”字样,而无法看出业务的具体执行者是否为沪行,这也是笔者在研读资料的过程中遇到的“拦路虎”。本书在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进行研究时,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梳理与界定,以深化相关研究。

对于1935年以前中国银行的行史进行研究的专著值得一提的是姚崧龄所著的《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张公权先生建立近代化金融组织基础之成就》〔刘绍唐主编:《民国史料丛刊》,第29种,(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①姚崧龄曾在中国银行任高级职员20多年,对于中国银行的业务及行务情况都颇有了解。《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是他写的关于中国银行早期发展情况的行史,部

^① 在成书出版前,《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连载于《传记文学》25卷3期至26卷4期,27卷1—3、5期,28卷1、2期。

分内容被辑入《行史资料汇编》中。此书中相应章节介绍有关上海分行的情况,如“上海中国银行管理与业务近代化之提倡以及上海近代金融组织之发轫”;“上海中国银行抗拒北京国务院停兑命令与长江沿岸各分行之响应”;“巩固纸币信用,发行准备集中与抗拒军阀强迫借款”;“上海中国银行发行准备全部公开,加强巩固纸币信用”;“上海‘一·二八’事变与同业合作防止金融风潮之爆发”等等。

由于中国银行的历史地位重要,业务范围广,故有关的行史资料范围极广。除专门的行史资料汇编外,在其他相关的金融史资料和民国史资料中,也会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如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 1912—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 1912—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各辑中的财政金融分册和财政经济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至 2000 年间陆续出版);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 1907—1949)》(档案出版社 1991 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中国货币史银行史丛书编委会编:《民国小丛书·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共四册,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在金融史的著作中,如洪葭管主编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杜恂诚所著的《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年版)等,在相关章节都对中国银行及上海分行有所论及,有助于研究者了解中国银行的历史定位和所起的作用。《中国金融史》在第四章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金融中有专目提到中国、交通两行的两次停兑风潮始末,对于 1916 年的停兑风潮,作者认为“反对停兑令行动的成功,实质体现了江浙财团与北洋政府的一次较量”。《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对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涉及颇多,如提到为了在沪区推行兑换券,1915 年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与浙江兴业银行订立领券合同,其他银行也纷纷效仿。第二章第六节专门叙述“北洋政府的停兑令及上海等地中行抵制停兑”,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抗

令得到中外银行业的支持,得到多笔借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丰富的 1949 年前中国银行的档案资料。中国银行与二史馆合作,抢救开发整理有关档案。经过一年半的编辑整理工作,此项目已顺利完成,并于 2001 年 11 月 30 日在北京中国银行总行举行了项目成果移交仪式。^①二史馆与中国银行的有关专家共编撰了 8 个专题的资料:《中国银行历史名人传》、《中国银行行史图片集》、《中国银行股本变化资料》、《中国银行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办法及具体实施情况史料》、《中国银行董监事会行务会及股东会议史料》、《中国银行组织机构变化史料》、《中国银行发行公债钞票档案史料选编》、《中国银行行员手册》,共 230 余万字。我们也期待这批珍贵的档案资料能够早日正式出版,与中国近代金融史研究者见面。

除进行概括性的研究外,在对 1949 年前中国银行历史进行的研究中,有几个热点问题,相关的专文屡屡见诸专业刊物、学术刊物和论文集,并有一些相关的回忆性的文章载于文史资料中。

热点之一:中国银行的成立、与政府的关系及历次改组

关于中国银行的建立,《行史》认为中国银行是由大清银行所“改”而来的,并在南北议和后得到了袁世凯的承认。而孔祥贤撰《中国银行并非大清银行所改》(《财经研究》,1986 年第 1 期)认为,从中国银行的筹建、股本来源与筹办费、大清银行的财产折价与兑换纸币问题、大清银行的清理等四个方面来看,中国银行并非由大清银行所改而来,而是“民国新创立之中央银行”。孔祥贤的另一篇文章《中国银行是怎样成立的》(《民国春秋》,1992 年第 1 期),介绍并分析了民初的政局、原大清银行集团南北两派的矛盾及中国银行成立初期内部对于权力的各种纷争。无疑,中国银行与大清银行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中国银行是由大清银行改组而来的,已得到《行史》的确认。上海中国银行是中国银行成立的第一个机构,后于 1912 年 8 月改设为分行。对于中国银行初创时期的相关论述介绍了上海中国银行成立时的外部环境 with 政治氛围。聂其炜撰《我和 1913 年时的

^① 相关介绍参见《民国时期中国银行历史档案合作抢救整理与开发项目顺利完成》一文(《民国档案》,2002 年第 1 期)。